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经济研究参考资料

第51期

总第51期

A—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年4月2日

在全国经济科学规划会议上 关于经济科学中若干理论 和实际问题的讨论纪要

全国经济科学规划会议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日至十日在北京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 257 名，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研究机构、高等院校、新闻出版部门的专家、学者和有关负责同志。中央有关部委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理论务虚，第二阶段修改、落实规划。在理论务虚中，他们初步提出了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现将他们发言的要点整理如下，供参考。

一、政治经济学

吴敬琏同志在大会上的发言

随着对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批判的深入，广大干部和群众迫切要求在一系列问题上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如：搞副业生产、多种经营是不是“以钱为纲”，“走资本主义道路”；重视群众的物质利益是不是“资本主义的物质刺激”；允许社员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存在，是不是“为资本主义供氧输血”；什么叫“堵不住资本主义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经济研究参考资料

第51期

总第51期

A—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年4月2日

在全国经济科学规划会议上 关于经济科学中若干理论 和实际问题的讨论纪要

全国经济科学规划会议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日至十日在北京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 257 名，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研究机构、高等院校、新闻出版部门的专家、学者和有关负责同志。中央有关部委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理论务虚，第二阶段修改、落实规划。在理论务虚中，他们初步提出了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现将他们发言的要点整理如下，供参考。

一、政治经济学

吴敬琏同志在大会上的发言

随着对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批判的深入，广大干部和群众迫切要求在一系列问题上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如：搞副业生产、多种经营是不是“以钱为纲”，“走资本主义道路”；重视群众的物质利益是不是“资本主义的物质刺激”；允许社员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存在，是不是“为资本主义供氧输血”；什么叫“堵不住资本主义

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说“穷是社会主义，富是资本主义”对不对；等等。而要真正划清这些界线，又必须首先回答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林彪、“四人帮”的一系列谬论，还涉及到文化革命前后的一些提法，这些提法写在通用的教科书、党的文件和领导同志的著作中，过去一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因为这是大家久已习以为常的说法，今天就往往成为政治经济学上的禁区。这个禁区必须打破，因为如果什么是社会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不解决，一系列具体问题上的界线就无法真正划清。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冲突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对这种矛盾的分析，指出必须用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代替资本家的私人占有的历史必然性。恩格斯说，私有制必须废除，“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共同协议来分配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7页）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以后，我们应当而且有条件把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作的原则提示具体化。但是，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概念所作的具体化不都是正确的。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问题上，我国的政治经济学书籍长期沿袭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说法，认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就是国家所有制，或者说，国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完善的形式。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值得研究。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分析国有制的四点特征时，把全民所有制归结为国家机关对生产资料 and 产品的支配、管理和分配；同时又讲，“国营企业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最成熟、最彻底的”。这样一来，就把国家机关的支配、管理、分配说成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成熟、最彻底的形式。不能不说，这种说法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所有制（财产）本来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政治经济学上说的所有制，就是指全部生产关系的总和。生产关系是按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形式来区分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特点是什么呢？是劳动者

直接占有生产资料，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归结为国家或国家机关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显然是不妥当的。

马克思、恩格斯的确说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要把生产资料掌握在自己的国家手中。这就是说，剥夺资本家后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但是，他们同时又说过，“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0页）因此，在他们的设想中，国有制不会长时期地存在下去。

当然，在我国这类落后国家，革命胜利后国家还会存在相当长的时期。在国家还存在的这段时期中，公有制会怎样发展，是不是一定要采取国有制的形式？这是一个国际共运中有不同意见，需要探讨的问题。但是，无论国有制是否会长期存在，把国家和国有制理想化是不正确的，更不应该散布“国家迷信”。恩格斯讲过，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争得统治地位以后从旧社会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虽然为了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还不能没有这个“祸害”。全民（全体劳动人民）和国家机关是不能等同的。正如列宁所说：苏维埃国家，第一，还不是工人国家，而是工农国家；更重要的是第二，它是一个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国家。因此他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保护全体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使它免受自己的国家政权的侵犯。理论和实践经验都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虽然是劳动人民的国家，但是，并不是任何时候，国家的利益、国家机关的利益都是和全体劳动者的利益完全吻合的，都不会出现国家机关侵犯劳动者利益的情况。

可是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学论著中，都常常沿袭苏联教科书观点，把国家和国家机关看成劳动者利益最完美无缺的、至高无尚的代表。这样一来，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变成了国家、国家机关的占有；劳动者的权利和利益变成了国家、国家机关的权利和利益。这有可能给某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个别脱离群众的领导人员以社会的名义侵犯劳动人民利益的口实和机会。前些时揭发出来的象陕西旬邑、河南信阳严重侵犯群众权益的事件，无不是打着“无产阶级国家”的旗号干的。而且，搞得不好，公有制还有蜕变成官所有制的危险，比如说在林彪所谓的“领导班子就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的条件下就是如此。

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上面这种错误理解，在实践中产生了很不好的后果。为什么有的人认为，只要是按上级的计划指标种植，那怕是祸国殃民的瞎指挥，也是社会主义；反之，根据生产队自己的条件种植，那怕完全符合社会利益，也叫“自由种植”，也是“资本主义”？因为他们不是把计划性理解为社会自觉地保持比例。而把它理解为国家机关的意志支配；因此，只要是按国家机关和机关干部的意见进行生产和流通，不管合不合乎客观的比例要求，都叫“计划性”。这也许是我们这里凭“长官意志”办事的坏作风广泛流行的一个原因。

斯大林同志领导时期的苏联政治经济学，存在把国家所有制理想化的错误倾向，但他们同时还讲，国家也要考虑它的“雇员”——劳动群众的利益，实行“物质利益原则”。而在我国近十几年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余年间，连这一点都不讲，政治经济学一方面承袭了苏联教科书把国家机关理想化的错误观点，另一方面又批判了“物质利益原则”，结果就发展到完全用国家机关利益来吞没、排斥劳动者的个人利益的地步。这种理论，是只有利于林彪、“四人帮”一类复辟狂、野心家，而不利于劳动人民的。林彪提出了所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就是“公”与“私”的矛盾的理论，说什么：社会主义概括来说，就是一个“公”字，资本主义概括起来，是一个“私”字。这样就把国家利益与劳动者的个人物质利益对立起来了，完全歪曲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公”是不能离开每个劳动者的利益的。如果把“公”和劳动者个人利益（“私”）完全脱离开来，对立起来，用它来压制和排斥劳动者的个人利益，这个“公”是什么呢？它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公”（即劳动人民的集体），而只能是某种高踞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机关，是极少数脱离劳动人民的国家机关领导人。这样的“公”有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了。马克思在讲到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所有制时说过，这种所有制是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68页）。毛泽东同志也指出：社会主义精神就是“以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生产关系是首先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作为利益表现出来，就是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结合。违背这个原则，也就损害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我们认为，同劳动人民的公共利益相脱离和对立

的“私”固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同劳动者利益相脱离和对立的所谓“公”，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封建主义。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过：是不是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是我们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这种完全脱离劳动者的利益的“公”在中国历史上是存在的。在古汉语中，“公”不过是官家的代称而已。郑玄注《礼记》时说：“公犹官也”。

“公车”是官车，“公服”是官吏的礼服，“公族”是诸侯的同族，“公庭”是国君的庙庭。林彪心目中的“公有制”也就是他那个父子王朝的所有制；“四人帮”心目中的“公有制”则是江青女皇及其小帮派的所有制。无庸置疑，他们的这种所有制，只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否定。

林彪、“四人帮”在“公”与“私”的问题上歪曲社会主义的谬论所造成的影响也是十分严重的。他们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原则说成是“公私溶化”的“黑论”，他们还把“私”和“修”等同起来，弄得人们不敢讲劳动者的个人利益，谁一讲要关心劳动群众的个人利益，就会被戴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遭受各种各样的凌辱和打击。反之，林彪、“四人帮”为封建、半封建复辟制造舆论的“公”字主义，却被当作“社会主义”而大加吹捧。这种“公”字主义的流毒十分深远，至今还有待于肃清。

（二）什么叫走社会主义道路？

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问题，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政治经济学界是有共同认识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和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规划的道路。这是全党一致同意的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概括讲来就是：中国革命分成两个阶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在人民民主专政和新民主主义生产关系（毛泽东同志又把它叫做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即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五种经济形态并存的生产关系）的保护下发展生产，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逐步将新民主主义社会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去。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指出，这条道路是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根据中国工业很不发达的实际情况采取的。经济形态发展的最根本的规律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社会主义是社会化大工业的产物。由于旧中国现代工业只占整个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十几，“要想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根据这个思想，解放后我们党领导劳动人民剥夺了资本，实行了土地改革，并把全党工作的中心转到经济建设方面来，接着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办起了互助组和合作社，对个体经济进行改造。按照七届二中全会规定的道路，采取了这些正确的措施，所以在解放后直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几年，我们的经济发展是快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也是健康的。理论和实践都说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性。

但后来，这条道路受到了怀疑，在一些问题上偏离了这条道路，使我们的事业受到挫折。到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它完全遭到否定，被认为是一条修正主义道路，资本主义道路。而另外一种理论，另外一条道路却占了支配地位，结果给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的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偏离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阐明的理论，偏离七届二中全会所确定的道路的观点，很早就有冒头。一九五三年批判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口号，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总路线规定的任务是在十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里，实现国家工业化，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国民经济的唯一基础。当时把工业化叫做“一身”，三改叫做“两翼”。这就是说，工业化是主体，私有制的改造是从属于这个主体的。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上，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段话：“社会主义工业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这个思想是非常正确的。可是宣传提纲在引述了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以后，接着又写道：“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技术上起一个革命”。这就是说，只有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生产力才能够迅速发展，才能完成工业化。显然，后一提法是和前一提法对立的。按后一说法，事情就完全倒过来了，不是发展生产力奠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而是生产关系的改造先行完成，脱离了自己的物质基础，成了没有身体的翅膀在天空中飞翔。

在一九五六年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出现了冒进的偏向，这主要表现在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五年批判了“小脚女人”，对

于这次批判，哪些进行得正确，哪些有毛病，还需要进行研究。但是有两方面看来是可以肯定的：第一，当时把技术改造（机械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结合起来进行，以及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合作化的设想是正确的和切实可行的。第二，与此同时，合作社越大越好和“化”得越快越好的“左”倾思想也滋长起来。尽管只用了一年就使大部分农民参加了初级合作社，大大提前实现了原定的计划，仍觉得不够快，接着又提出，办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办大社和高级社才能冲破这种束缚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这样，一九五六年就实现了高级合作化。显然高级社的规模太大，“化”的速度太快，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利的影响，直到一九六一年毛泽东同志亲自作了调查，一九六二年下放基本核算单位，才又回到小社的规模。在高级合作化后，党的“八大”前后已发现了冒进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改正。但是后来把“反冒进”视为“右”倾，决议以后，不许反冒进，也就是不许反“左”，只能反右，并且在一九五八年下半年进一步并社成立人民公社，使生产关系同生产力更不适应。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问题就更加发展了，不仅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要用大集体所有制代替小集体所有制，还要以全民所有制代替集体所有制，甚至要用共产主义代替社会主义。一九七五年初“四人帮”利用“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大做文章，更进一步要用没有资产阶级权利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去代替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认为只有这样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说，搞社会主义也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了，因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要维护资产阶级权利，而这一条就足以构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弥天大罪。按当时报刊的说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也就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否定社会主义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有什么比这更荒唐的呢？

这些“左”的东西对我们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是很大的。有些人至今认为允许社员有一块自留地，搞一点家庭副业是“资本主义”，合作小组自负盈亏是“修正主义”等等，就是受了这种理论的影响。我们需要回顾历史，实事求是地研究合作化、批判“反冒进”、公社化以及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八大”的政治报告，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等运动中一些提法的是非。这样做的目的是向前看，端正路线，落实政策，把现代化建设尽快搞上去。

历史的经验说明，用“左”倾机会主义那一套办法人为地强制改变所有制关系是行不通的。政治经济学从来把所有制看作生产关系之外的单独的法律关系。离开了生产力水平，改变的只不过是所有权的法律规定，实际的经济关系不会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相反，它还会由于生产力受到破坏而倒退。在手工劳动的条件下，以人对人的直接支配和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劳动组织形式（包括个体经济中家庭成员对家长的依附和庄园中农民对领主、庄头的依附）往往是易于行得通的。要实现全面合作化并使集体经济在自愿互利原则的基础上巩固起来，根本的出路在于机械化。如果不走这条必由之路，企图在手工工具的基础上全面改为大规模的经济，长期持续下去，实际上容易造成一部分社队干部用强制的方法来组织生产，实行政长式的管理。如果不是在生产社会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社会化，而是搞“穷过渡”，人为地把集体所有制的规模搞得很大，那么，集体的规模搞得越大，越会使一些干部滥用国家强制，剥夺农民的经济和政治权利，造成集体经济“国家庄园”化的倾向。这种封建主义影响扩大的情况反映到工业和商业中来就是所谓“官工”化，“官商”化的倾向。总之，前些年林彪、“四人帮”动辄挥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棒打人，说干部是“走资派”，群众是“走资兵”，叫嚣“用专政的办法”办工业，办农业，办其他事业，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当作资本主义来打，又把封建主义当作社会主义来捧，目的是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复辟。

（三）政治经济学工作者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战斗任务。

理论是实践的概括，由于在一个时期中生产力的发展受到阻碍，甚至遭到破坏，使得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侵入了某些比社会主义落后，甚至比资本主义还要落后的因素。实际生活中出现的这种现象被概括成理论，就使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渗入了剥削阶级思想的杂质，影响了社会主义的纯洁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除了科学社会主义，还有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除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成长起来的先进阶级的社会主义，还有注定要被资本主义大工业所消灭的阶级的社会主义，这就是小生产者的社会主义和封建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两种社会主义叫做反动的社会主义。林彪、“四人帮”时期充塞于报刊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有不少反动社会主义的货色。我国传统的封建

经济思想的主要武器，一个叫“重本抑末”，（或者叫“重农抑工”、“重农抑商”），就是维护自然经济，反对分工和交换；一个叫“崇俭黜奢”就是鄙薄物质利益，主张按身份等级分配：少数人的特权加多数人的饥饿平均主义；集中到一点，则是美化人和人之间直接支配和隶属的宗法关系，反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这些年来这种宗法制的、封建主义的思想往往披了一件薄薄的社会主义外衣出现在我们的理论宣传中。例如那种反对多种经营，把种植经济作物叫做“吃亏心粮”，把发展集体副业叫做“搞集体的资本主义”，在群众中提倡禁欲主义，把劳动人民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在一小撮人中又搞“按需分配”，挥霍无度，以致货币对陈阿大已不起作用，如此等等，都不外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一个时期，经济学不能提物质利益，不能提“钱”字，好象跟资本主义的界线划得很清楚，其实是仿效封建士大夫王衍“口不言钱”，谓之“阿堵物”的故事。

为了真正做到拨乱反正，需要正本清源，把鱼目从珍珠中清除出去，把浸入到我们政治经济学中的小生产者的思想和封建地主思想清除出去，批判各种反动的社会主义，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两年多来的实践说明，如果不在理论上弄清楚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什么是小生产者的社会主义和封建社会主义，我们的拨乱反正措施是不可能得到正确贯彻的。相反，如果理论上没有解决问题，人们用旧思想对待新措施，再好的措施做起来也会变样。两年来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不少教训。比如，我们反对凭长官意志管理经济，提倡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采取的一个措施是建立专业公司，可是有相当一部分公司并不是靠经济机制运转的，是换汤不换药的行政机关，甚至比原来的机关更加了一层衙门和一群长官。又如为了贯彻按劳分配实行了奖金，但是由于平均主义的思想 and 作法不变，结果只不过是由饥饿平均主义变成了稍高水平的平均主义，花了很多钱，没有收到效果。再如，打破了闭关锁国状态，从外国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如果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用封建衙门式的办法去对待它，就决不会有好的效果。极而言之，就会搞成“洋务运动”。

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对政治经济学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在我们面前百废待举，问题成山，我们必须集中主要力量解决阻碍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前进的关键问题，而不能同时全面铺开，希图一

下子统统得到解决。当前，我建议把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工作的一个重点，为落实政策，调动积极性的拨乱反正工作开道。

孙冶方同志在大会上的发言

孙冶方同志就全国经济科学研究规划的题目提出了重要建议。现将他建议的要点整理如下：

（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货币、八级工资制和旧中国的同类范畴到底是差不多还是差得多。他从迫切需要把农业搞上去强调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说：经济范畴是生产关系的反映。能不能说社会主义的商品、货币、八级工资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同类范畴差不多呢？柬埔寨把货币取消，实行物物交换，实物分配，恐怕是受这个理论的影响。把配给制，计划供应说成是分配，这是概念上的混乱。我们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弄清这个问题。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

（二）关于体制问题，包括企业管理体制，财政体制、物资管理体制。他说：李富春同志曾对我们讲过，体制问题，应该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我非常赞同。体制，从本质上说，就是生产关系，从中央到省、市、地方，从条条到块块的生产关系，这是直接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中央最近提出体制要改革，就物资管理体制来说，当前主要的还不是条条与块块的关系，而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供、产、销的关系，也就是企业的权限问题。体制最大的问题是管死了。燃料、设备归物资局统一分配，其实统配制是个很大的浪费。物资越缺乏，需方越要打埋伏。否认产品流通，这是自然经济思想，是封建的小生产思想。对“四人帮”来说，还不完全限于封建的小农经济思想，还应该加上封建士大夫的思想，陶渊明的桃花源中思想。

（三）关于“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还是“按客观实际规律办事”，这两种提法哪一种好。他说：现在都习惯于说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而不要行政的办法管理经济。其实一定的行政措施还是必要的，现在把行政措施否定过头了，西方资产阶级把我们的计划经济曲解成行政办法，而把他们的那一套说是经济办法。我们还是讲按客观经济规律办

事，符合客观规律的行政办法，也是用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经济。客观规律和利害关系是分不开的。他介绍了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们认为照顾各方面的利益，在各方面的利益协调下管理经济，就是经济办法。

（四）关于什么是生产关系？生产力是三因素还是两因素？他说：斯大林对生产关系、生产力的看法，我认为是错误的，给实际工作带来了很大混乱。我们现在有很多设备机器的品质不好，关键是原材料，如果原材料好一些，机器耐磨，不就是一种生产力吗？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有工具的革命，而且也有原材料的革命，如用合成材料代替钢材。斯大林对所有制的解释把流通、交换、分配都排除在外，这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最早离开生产关系、经济往来研究财产所有权的是蒲鲁东，马克思批判了他。当然，这并不是说财产所有权不重要了。他还说：我们二十多年来阶级斗争扩大化，是和所有制过渡的急躁病相联系的，离开生产力、离开生产关系谈所有制，在所有制上不断做文章，为所有制的改变而改变，使生产力受到了很大破坏。

（五）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以三十二万个旧企业为主还是以每年新建和引进的二三百个新企业为主。他再次批评了我国固定资产管理制度，设备大修不准改变外形，不准增值，折旧年限很长，结果成了“古董复制品”，影响了企业设备更新和新技术的采用。

孙冶方同志还非常感慨地说：我们经济科学在新时期应该研究的问题很多，特别是那些A、B、C方面的问题更应下功夫。

分 组 发 言

中国人民大学宋涛同志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值得重新研究。朝鲜、柬埔寨、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制度上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如生产资料公有制、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等，但各国都有自己的特点。如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计划方法、分配形式等，南斯拉夫和我国就不一样。究竟哪一种做法对生产发展有利，需要进行认真的考查。再如，我们所处的时代也应重新研究。现在的资本帝国主义，同列宁写帝国主义论时资本帝国主义比较，生产力、生产社会化有很大的发展。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物质基础，——消灭三大差

别，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实现。工农业正在结合，农业正在工业化，工人农民的生活水平正在接近；研究人员的比重正在增加，工人农民中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工农业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正在接近。列宁说，家务劳动社会化是共产主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家务劳动社会化也正在实现。资本帝国主义的这些新特点，是否会影晌今后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如何走上社会主义？应该研究。我们不能再拘泥于列宁的说法。在我们所处时代的问题上，经济理论工作者应该开动脑筋想一想。出现了新问题，理论工作者不敢提出来，不敢研究，还算什么理论工作者。

天津市委宣传部长黎干同志说：我们搞的是不是社会主义？我们现在究竟处在什么社会发展阶段上？值得研究。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这种社会在哪里？不知道。原来说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后来又说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向社会主义过渡，应弄清楚。如果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向社会主义过渡，那就应该研究这种过渡的特殊形式。

上海社会科学院董逸峰同志说：我们搞的名为社会主义，实际上在许多方面封建主义仍占优势。企业是“封建割据”，用封建的、小生产的办法管理经济等等。

甘肃省社会科学研究所以顾宝孚同志说：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问题要弄清楚。口粮三七开，明明是平均主义，是生产力极端落后的表现，可有人硬把它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低工资，高就业”，避免不了平均主义。如果工资水平高些，工人宁愿爱人在家里，把家务搞好一点。

复旦大学蒋学模同志扼要地讲了自己参加上海理论务虚会的体会，介绍了上海务虚会上提出的一些经济理论问题和看法。

他说：关于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当然，生产斗争是比阶级斗争更本源的东西。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而且是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矛盾的反映。从历史上看，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当它还处于上升时期的时候，虽然也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矛盾，但阶级斗争一般不很激烈。只有当一种生产关系已走下坡路，成为腐朽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着生产力发展的时候，代表腐朽生产关系的那个阶级同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那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才会尖锐化起

来。问题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当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究竟会表现为什么样的社会矛盾？从现实状况来看，不论是集体经济或国营经济，生产关系的代表都不是资产阶级，而是集体化农民、工人以及集体经济和国营经济中的党和非党的干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又相适应又相矛盾，其相矛盾的一面，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自觉地加以调节，使之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即使有人阻碍这种调节，也只能表现为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不可能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过去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都要表现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三大改造完成以前，可以说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是主要矛盾。但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继续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是主要矛盾，这个提法就不对了。谁代表资产阶级？林彪、“四人帮”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是资产阶级权利，其代表人是“党内资产阶级”，那当然是一派胡言。文化大革命中给几十万党员干部戴上了“走资派”的帽子，查实下来没有一个真正的走资派。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搞清楚了，有些提法如“以阶级斗争为纲”、“抓纲治国”、“抓革命，促生产”等方针、政策的是非就容易分清了。提出“抓革命，促生产”以后，许多生产单位的第一把手抓“革命”，只有第三把手抓生产。给生产造成很大影响。

《矛盾论》中提出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论点，究竟应该怎样看？这里有一个从什么角度来理解的问题，如果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反作用的角度来理解，那么在不变革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革确实就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决定性环节，在这个时候，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特别强烈，特别明显，从上述角度来理解，这个论点是可以成立的。但如果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谁是主要的矛盾方面的角度来理解，那么，这个论点就不对了。在任何时候，生产力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总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总是社会生产的内容，生产关系总只是由生产力性质决定的社会生产形式。一九五八年以后，我们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方面变动频繁，这同片面强调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有关，这个思想，后来被林彪、“四人帮”严重歪曲、篡改。林彪提出什么“四个第一”。“四人帮”把反作用篡改成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

阶段，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都起决定的作用，以此作为实现其打击老干部，篡党夺权的理论依据。

他说：什么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把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和封建社会主义区别开来，这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科学社会主义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要以极大的精力来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极大地提高。可是我们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不重视发展生产力，不重视改善人民的生活，反而把生产力的发展视为畏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把人民生活的改善，视为有“富则修”的危险，似乎只有穷才光荣，才保险。这样的社会主义，决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而只是反映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思想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在国际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类型是差不多的。为什么有些国家是社会主义，有些又是修正主义？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生产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中最根本的关系。判断一个国家属于什么性质，不能以它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为根本依据，而应以社会经济制度为根本依据。怎样从社会经济制度方面来区别东欧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限，是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问题。

南京师院李振坤同志提出：合二为一，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无产阶级贫困化以及“四人帮”横行时全民所有制企业不如集体所有制企业等问题，都是实际生活中存在的问题，都必须提出来研究。奖金问题也应该研究。奖金应该发，但有些人发奖金是给奖金抹黑。有些人不清楚为什么要发奖金、如何发奖金，胡发乱发，造成了不良后果，反过来还说奖金不好。这种作法上的缺点错误，不能算在奖金的帐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董辅初同志说：由于“四人帮”的严重破坏，我国国民经济已处于崩溃边缘，发展经济还采用大干快上大跃进的方针是有问题的，应该重新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例如把电力缺口补上，生产能增长30%以上。他还说，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下，实行企业自负盈亏就会引起很多严重经济问题甚至政治问题。

武汉大学曾启贤同志谈到，当前帝国主义国家的一些情况与《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提到的情况不同了。如讲绝对地租来源是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而现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农业资本有机构成高于工业，等

等。对这些问题需要从实际出发认真研究。对社会主义经济也需要认真总结经验，包括苏联和东欧的情况。还要研究外国对我们的看法，例如美国有个人就论证了所谓“社会主义经济循环波动”问题。

山东大学马家驹同志说：在今天，许多新的问题不能从经典著作中找出答案。但另一方面也还没有充分发掘、研究经典著作中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到现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注意不够。他还说，这些年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一方面存在哲学的贫困，另一方面又存在哲学的泛滥，好象总想要做出简单的哲学概括，却又缺乏具体分析。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李哲同志在发言中谈到，我国经济发展“左”了这些年，主要就“左”在一平二调三统和供给制式的自然经济搞法上，总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商品经济。如果不从这种观点下解放出来，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就搞不好。

二、工业经济、基本建设经济

薛葆鼎同志在大会上的发言（摘要）

薛葆鼎同志在谈到关于国民经济的几个问题时，列举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几个历史时期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数字后指出：无论就工农业总产值还是国民收入来说，发展快的是恢复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和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时期。与此相反，在大跃进时期和受其严重影响的三年困难时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生产都是增长很小，甚至下降的，人民生活几乎没有什么改善。他还指出：这两种情况都不是偶然发生，而是反复出现的，这充分说明，在国民经济上升情况下的指导方针是比较符合经济规律的，是正确的，而在国民经济下降情况下的指导方针是不符合以至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是不正确的。他认为：要使我们的经济工作转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非批判经济工作中的极“左”思潮不可。

围绕这点，他还就有关几个经济理论问题谈了几点看法。

最后，薛葆鼎同志对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潮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批驳。他指出：“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同志根

据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实践经验，借鉴苏联的教训，写出了《论十大关系》这样的科学总结。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锐利思想武器。

同时，他还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和其它任何事物一样，同样是一分为二的。对的就坚持，不对的改正，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历来的态度，也是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后一个时期所抱的态度。我们大家也应当采取这种态度。

目前在经济理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是一些经过实践检验，早已证明是错误的，并且有些已被毛泽东同志否定了的东西，如大跃进以来曾经流行一时，而现在还被一些同志视为经济工作理论根据的东西，并没有在理论上分清是非。我们经济工作者应当着力研究解决这类问题，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辩明是非。这对于迅速地合乎规律地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避免再犯过去多次重犯的错误，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是有重大意义的。

分 组 发 言

薛葆鼎同志提出在现实经济中还有不少禁区，为保证把工作的着重点顺利地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需要大家敞开思想，冲破禁区，畅所欲言，并举了“以钢为纲”问题，“积极平衡与消极平衡”问题等为例。他说：“以钢为纲”脱离了综合平衡，提高指标、大方案，同时又把计划留有缺口作为“积极平衡”，把“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的哲学语言加以绝对化，作为国民经济忽而大上，忽而大下的掩饰，从而破坏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内在的比例关系。他说，现在经济领域里现实问题成堆，要在理论上方法上加以探讨，求得合理解决，工作量很大。例如，经济体制中，人、财、物各有系统，供、产、销互不见面，对企业管理的利弊如何？是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还是按重、轻、农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任意排放“三废”是否算解放思想？工业布点应不应该考虑水、电、煤、运输等外部条件，如此等等，都必须严肃对待，实事求是地研究。这不是什么“砍旗”、“丢刀子”，更不是什么“赶时髦、大转弯”，十几年来林彪、四人帮之流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大破坏，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还要说大话，指鹿为